

我与曹禺的交往

○曹树钧*



1987年在北京曹禺寓所，左2为曹禺，右1为作者

1990年5月，我与俞健萌合著的《摄魂——曹禺传》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曹禺的文学传记，是在曹禺先生亲切关怀下出版的。2012年9月，是我从事曹禺研究50周年纪念，而曹禺先生离开我们已经16年了。回顾我与曹禺剧作近半个世纪的接触，我的缘于曹禺剧作的戏剧情结，便一一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际，成为永志难忘的人生记忆。

一、撰写《年表》请曹禺指正

我于1963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1962年9月毕业论文选题便是《〈曹禺〉人物论》。1981年，经过多

*本文作者为中国曹禺研究会副会长，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年的资料积累，我撰写了一篇近3万字的《曹禺年表》在一家刊物上发表。为了进一步开展研究，我冒昧地给曹禺先生写了一封信，请他的夫人李玉茹代为转交，并附上此刊一份，请先生提出意见，并告诉先生“结合《中国话剧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我选择您的作品，准备从中国话剧发展史的角度进行系统的学习与探讨，并想从编写较详的《年表》、《年谱》开始……在编写《年谱》的过程中，也很希望得

到帮助和指教。”在信中我还具体列了18个疑问，请曹禺先生释疑。信送出之后，我又有些后悔，感到此举太唐突。自己当时不过是上海戏剧学院一名年轻的讲师，怎么能如此打扰早已蜚声海内外的戏剧大师？不料，隔了不久，我便收到曹禺先生的一封亲笔回信，信中说：

曹树钧同志：您的信早已收到，因病因事迟迟未复，深以为歉。现请田本相同志在你发问的信纸上旁注。希望未耽误您的研究工作。

敬祝安好。

曹禺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六日

令人感动的是，先生对我信中提出的18个问题，逐一作了回答，有的问题作了相当详尽的亲笔回复。例如：

笔者问：赵丹同志1937年曾同您洽谈《原野》演出一事，后来此剧如期演出了没有？

曹禺答：我在1937年夏到沪与赵丹、舒绣文等演员与导演会谈过。他们一直在沪演出，直到“七七事变”后被迫停演。可问北京电影制片厂老导演朱今明同志。

笔者问：《原野》的素材除来源于段妈的叙述外，其他还有什么出处？当时您是否到农村访问或住过若干时候？

曹禺答：关于农村破产，农民逃荒，农民在乡下受地主恶霸迫害压榨，我在天津从各方面书报上，我周围的来自乡下的女仆人等处知道不少。我亲眼看见来天津逃荒农民凄惨悲痛情况，但我未到农村体验生活，我只见过附近农村凋敝、民不聊生表面情形。

曹禺先生对年青学者的回信，极大地鼓励了我深入探讨曹禺剧作、研究戏剧精品的情。

二、“创作不是照猫画虎”

我和曹禺著作爱好者俞健萌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有一个设想，想写一部反映曹禺一生的文学传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稿约正好和我们的愿望不谋而合。在这之前，由我执笔写过一篇长达3万字的文学评传《曹禺的青少年时代》，简称《青年曹禺评传》，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摄魂》这本书的一个毛胚或大纲，初稿根据1984年10月曹禺先生的意见，作了较大的修改。1985年秋，专程赴北京再次聆听他的意见，准备再作修改之后由上海文化艺术报发表。

北京一过立秋，下了几场雨，清晨和傍晚显得格外凉爽舒适。一天下午，我们应邀在北京曹禺寓所里见到了曹禺，他的学生都敬称他为万老，我们便也这样称呼他。

“你前几天寄来的稿件我已经看过了。”万老笑嘻嘻地招呼，让我在他身边坐定后，随即从书架上取出我的文稿。当我看到展开的文稿，钦佩之情油然而生。短短几天，这位文坛宿将竟已将我的文稿又一次作了仔细的修改，连一些标点的误差也一一作了更正。

先生又一次强调：“文稿对我褒扬过多。我这个人就是一堆感情，没什么可写的。其实，我的成就，都是人民给的，是人民提供了我丰富的创作养料。”

在谈到艺术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时，他指出：“现在有些人将我作品中的一些人物与生活中某某真人真事对号入座，这其实是不正确的。文学创作不是照猫画虎，总要想象、虚构，哪能简单地把生活原型搬入作品中呢？”他举例说：“《日出》第三幕中的翠喜确有其人，也叫翠喜。但是，《日出》中的翠喜并不是生活中那个翠喜的翻版。为了体验许许多多翠喜式的人物，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在天津采访了上中下各等妓院，有时是九先生（即曹禺导师张彭春——笔者注）陪我去，有时是戴涯陪我去，有时是孙浩然陪我去。”说到这儿先生停顿了一下，对我说：“就是你们戏剧学院的孙浩然，他当时叫成己。他平时讲话有些结巴，朋友们常开玩笑，称他为‘古巴’。我写到第三幕小东西自杀，他看了认为这样处理不好，太无美感。我反复考虑，觉得小东西是一个倔

□ 名师轶事

强、敢于反抗的女孩，最后写她自杀也是合情合理的，至于具体的艺术处理，导演会做出安排的。”曹禺告诉我们，当时天津的报纸，《大公报》也好，《庸报》也好，常有妓女被鸨儿毒打自杀的新闻，小东西这一形象就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

说到这儿，他翻看我写的稿子说：“关于《日出》的创作过程，我用蓝笔补写了一段，你们看是否合适？”我们一看，先生加了这样的一段：

在三个月的观察中，曹禺见到了许许多多翠喜式的人物。一个个被压在社会底层的灵魂一次又一次地在曹禺面前展现出来。他的心为之战栗：这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最黑暗、最需要阳光的角落啊！

这段话很概括地表达了先生典型化的创作方法，后来我们原封不动地收进《摄魂》一书中。

《青年曹禺评传》是阶段性评传，主要描述曹禺从小到《北京人》问世这30年的生平和创作道路。全文共十节。曹禺逐节谈了他的意见，一边还补充一些细节。在谈到第8节“见到了周先生”，他又深情地回忆起重庆时代周总理对他的亲切关怀：“1938年冬天，周总理派张颖同志捎来信。上次我说错了，说是给了我一封邀请信，可能没有信，你还可以再去问问张颖同志。”说着他就当即给我写了一封给张颖的信，并在信封上用毛笔写上张颖家的地址。

“在见总理之前，我在武汉时期，曾收到总理写给我一封长信，谈他看了《雷雨》后的感想，他很喜欢这个戏。可惜这封信因为多次搬家，不见了。那年冬天，

我到曾家岩50号周总理住处，初次见面，起先有些拘谨。没想到总理一点架子也没有，一见面就说你是南开毕业的，我也是南开毕业的，我们还是校友呢。一句话就把我的拘束全打消了。我同他谈起演《娜拉》、演《黑字二十八》的事，越说越高兴，总理就在这样无拘无束的谈话中，亲切地谈了许多抗日的道理。总理是那样的平易近人，他绝对不强加于人。解放后，他让我去协和医院体验生活，至于具体写什么，怎么写，他从不加干涉。重庆时期，我就喜欢朝曾家岩跑。再次去曾家岩，就觉得把国民党陪都的污浊都撇在了外面，觉得只有在这里才能呼吸到新鲜空气，让人心旷神怡……”

谈毕文稿意见，曹禺合上文稿，“你的文章其实是在激励我呀！”曹禺感叹地说：“我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体力日下，但我还想在有生之年再写点什么，总觉得自己还有不少东西没有倒出来，我还想再写点什么……我对自己在解放后这几十年没有写出好作品经常抱憾，对自己很不满意，也很苦恼，常常自问：这是怎么回事呢？”“现在回想起来，现在我每当拿起笔要写点什么，总好像无形之中有人攥住我的手，瞻前顾后，落不下笔。”这时曹禺用明亮的双眼看了看我：“我年纪大了，像到了秋天。各方面都不及年轻人。你正在年富力强的时候，跟你这样的年轻人谈谈，能得到新的活力。”

当我们告辞时，先生坚持送我们到电梯门口，并一路叮嘱：“关于我的早年生活，你们可以再去多找些同志谈谈，这样会更准确一些……”

三、“我是一堆感情”

1986年秋，应中央电视台之约，我执笔撰写了六集电视传记片《杰出的戏剧家曹禺》的初稿。这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与中央电视台摄制组几位同志来到曹禺上海复兴西路寓所，登门聆听意见。之前，电视传记片打印稿事先已请先生过目。

在小客厅稍等片刻，便见一位七十开外的老人从楼梯上缓步走了下来：穿一件中式棉袄，戴一顶绒线软帽，脚上是一双普通的布鞋，手里拄着一根拐杖。如果走在大街上，谁也不会想到这就是当年写出轰动剧坛的《雷雨》、《日出》的剧作家，准以为他是哪个公司退休的职员呢。

我们刚将来意说明，曹禺就说：“我写的东西不多，不值得拍电视传记片。你们应该拍郭老、巴老，还有夏公他们，他们才真值得拍。”我对曹禺说：“中央电视台有一个总的打算，这几位他们都已列入计划，巴老已经拍好了，关于郭老的传记片四川电视台已经找人写成了脚本，正在筹拍。”曹禺这才说：“既然你们一定要拍，那么需要了解什么，你们就随便问吧。”于是我便依照预定的访问提纲，提出一些问题请先生畅谈。

“曹禺先生，听说你从小就酷爱戏剧，能否具体谈谈？”

“我可以从小就是一个戏迷，看的戏多极了。谭鑫培谭家的戏，从谭鑫培、谭富英到谭元寿我看了四代。余叔岩的《打渔杀家》，龚云甫的《吊金龟》，刘鸿声的孔明，杨小楼的黄天霸以及许多曹操戏，还有韩世昌的昆曲《夜奔》等等，多得数不清。我告诉你，在南开的时候，

我还演过京戏：《打渔杀家》我演肖恩，《南天门》我演曹福……”

“万老，听说你还看过不少文明戏，能记得起剧名吗？”

“年代久了，让我想一想。记起来了，我印象中看过《新茶花》、《洪承畴》，还有秦哈哈演的文明戏，他的演技绝妙，我至今还有印象。”

我们的电视片重点要突出的是曹禺主要作品的创作过程，我请先生谈谈他构思作品的一些特点。先生脱口而出：“我这个人就是一堆感情。写《雷雨》的时候，我多少天神魂颠倒，食不甘味。虚伪的魔鬼让我愤怒，势利的小人让我鄙夷，纯情的女子让我喜爱，完全沉浸在情感的漩涡里。《王昭君》是总理生前交给我的任务，剧本写完了，我却再也听不到总理的声音了。想到这儿，我伏在桌上大哭了一场……”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极富感情的人，正因为这样，他才能以他的作品燃烧着每一位读者和观众的心。

四、“写剧本好比母鸡下蛋”

剧本的生命在于演出。在电视采访过程中，我经常结合曹禺的剧本问及一些有关的演出情况。在谈到《全民总动员》（即《黑字二十八》）演出情况时，曹禺兴致勃勃：“这个戏的演出可以说集中了重庆的所有大明星，白杨、赵丹、舒绣文、魏鹤龄、张瑞芳、王为一、章曼苹等全来了。那时是搞统一战线，国民党文化官员张道藩也上了台，连我这个五音不全的人也扮演了一个资本家侯凤元。我记得排戏的时候，我对女儿莉莉（白杨饰）说：‘我们走吧！回家走吧！再等下去，

□ 名师轶事

倒不是献花，成了献丑了。’我说完‘不是献花’，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出‘成了献丑了’，不知怎么搞的，一说完几位演员便哈哈大笑，扮演我女儿的白杨尤其笑得凶：排几遍她笑几遍，简直排不下去。没有办法我只好对凌瑄如下了死命令：‘湖南妹子，就你在旁边笑得凶。不许再笑了！’瑄如是我的学生，不敢不听，这才将戏朝下排。”

我又提了一个许久想问的问题：“1939年你创作的《正在想》，为什么取《正在想》这个剧名？”

“这事同剧专老师阎哲吾有关：剧专（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简称——笔者注）校庆，要我写一个新剧本，演出的事由阎哲吾管。他三天两头派人来催，问剧本写好了没有，催得我烦死了。一天，他又带两个学生到我家来催，我火极了，大声说：‘正在想，正在想！你别老催好不好！’阎哲吾当时站在那儿下不了台。我马上语气婉转地对他两个学生说：写剧本是个细致活，不能老一个劲地催。好比母鸡孵蛋，你看母鸡每天伏着不动，其实，蛋体里的小鸡正在成形。总有那么一天，不用你们催，那小鸡就破卵而出。你以为不慌不忙、老伏着不动的母鸡，其实，它正紧张地工作着哪！一番话说得阎哲吾和他那两个学生都笑了。后来，我索性将写出的剧本取名为《正在想》。”说完，曹禺开怀大笑。

当谈到童年生活时，曹禺神采奕奕，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童年的生活环境。为了叙述的方便，曹禺还在我的笔记本上画了一张简略的万公馆平面图（曹禺原名万家宝，他的家，人称万公馆。——笔

者注）。他一边指着图，一边说：“这儿是我家的大客厅，我父亲万德尊会客的地方；这儿是小客厅，后面靠里一间是我的书房，我就住在这里。”在小屋旁边，他又画了两道线，“这里是一个胡同，小时候，我经常听到逃难的灾民卖孩子的叫卖声，听了让人难过极了。那时，我小，心里害怕，睡不着就老缠着保姆段妈，要她给我讲故事。段妈也是从农村来的，在漆黑的深夜里，她给我讲了一个又一个农村破产农民流离失所的故事，又讲了她自己惨痛的家史……”讲着讲着，先生的眼圈里似含着湿润的泪。过一会儿，他说：

“她是我感激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是她，在我心灵里撒下了正义感的种子，同情穷人，厌恶为富不仁的有钱人。”他的这一回答，使我顿时对先生为什么能塑造出《雷雨》中的鲁妈、《北京人》中的陈奶妈这些劳动妇女的感人形象有了更加深切的了解。

五、登高壮观天地宽

1985年，由我执笔的阶段评传《曹禺的青少年时代》获得曹禺先生认可，使我撰写曹禺传的信心大增。1986年，我又执笔撰写了电视传记片剧本《杰出的戏剧家曹禺》（此剧本载于天地出版社1995年11月出版的曹树钧著《走向世界的曹禺》一书中）。1987年又跟随中央电视台摄制组沿着曹禺先生当年生活过的七个主要城市实地进行考察、拍摄。在短短几个月中，我跟随摄制组日夜兼程，跋山涉水，足迹遍布京、津、沪、宁、渝乃至橘子洲头的长沙，川江边上的小县江安，前后采访了近百人。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大量第

一手的资料，包括曹禺剧作的演出资料，这为以后系统地研究曹禺演出史打下较扎实的基础，同时，通过电视传记片的拍摄，我更加深入地熟悉了曹禺，了解了曹禺，积累了更加丰富的创作素材。聚沙成塔，厚积薄发。此时，我撰写曹禺传的时机也更加成熟了。

在写曹禺传的过程中，先生多次抱病长达数小时接受我们的访问，详尽地听取我们的写作大纲。更为荣幸的，是他给了我们极大的信任。1988年8月，我和俞健萌在中国青年出版社责任编辑韩秀琪同志陪同下，再次赴北京木樨地寓所郑重地听取先生对写书的意见。他说：“传记文学不同于正史传记，它应该是一种在史实基础上的文学创作。既然是文学创作，那就应该让作家有更多的自主权。我相信你们的采访和核实是到家的，我也信任你们会实事求是的。你们在史实基础上进行创作，这是你们的自由和权利，我无权干涉，因为你们只是用我的经历作素材，在写你们的作品。至于我，以我自己的作品和言行来让想了解我的人了解。你们从你们对我理解的角度，任贬任褒都无妨。”

后来，先生审阅了我们大部分文稿。由于身体多病，未能全部看完，他对此表示歉意。不久，我们两人先后收到先生挂号寄赠的条幅，表示对我们的支持和勉励。给我的条幅，全文为：

一九八八年早秋

登高壮观天地宽

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

香波九道流雪山

录李白诗赠曹树钧同志曹禺

先生对我们的这种支持和信任、关心和“放纵”，使我们由衷地崇敬这位戏剧大师的磊落和宽宏，同时又使我们感觉到身负的责任。1988年见面时，我们还告诉他，书名拟取《摄魂者的足迹——戏剧大师曹禺传》，并征求他的意见。先生说：

“大师这个头衔不要，我就是曹禺。摄魂这个词作书名好，不落俗套。”他并请作者另择时间选择一些关于他生平活动的照片编入书中。

1990年5月，35万字的文学传记《摄魂——戏剧大师曹禺》一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8月，听说先生住院，我专程赴京看望先生，并赠送刚发行的《摄魂》一册，对他的支持表示深切的谢意。先生躺在病床上，左手正在吊盐水。他右手拿着散发着书香的《摄魂——戏剧大师曹禺》，高兴地说：“祝贺这本书的问世，谢谢作家们辛勤的劳动。”他还说：“有的作者写关于他的书，老是从他这儿问这问那，你们主要靠自己广泛地作调查研究，这很不容易。”我告诉曹禺先生，下一步准备从演出角度研究先生的剧作。他说：“这样研究才对路，剧本的生命在于演出。不联系演出，剧本的得失就不容易说清楚，剧本的价值也不能充分地显示出来。”

六、《摄魂》问世之后

1990年11月16日，中国青年出版社等单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吉林厅召开《摄魂——戏剧大师曹禺》研讨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著名导演艺术家欧阳山尊与会之前还特地请示了曹禺自己是否可以出席？不一会，曹禺回电：“可以与会。”在这之前，在医院中，曹禺还多次

□ 名师轶事

征求前来探病的一些文艺界名人如刘厚生、傅惠珍等，征求他们对此书看法，他们都认为此书写得不错，很值得一读。

对《摄魂》的问世，曹禺的亲属、同事、学生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充分的肯定。曹禺的女儿万昭当年10月22日给我来信说：“《摄魂》不仅以爸爸的作品为主线，清晰而深入地揭示了每部剧作与中国社会、与时代、与剧作者思想发展的深刻联系，而且还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剧作者的生活道路。因而可以说，在曹禺研究的著作中，《摄魂》是独具特色的一部。”赞扬我们在写作中，维护了许多事实的历史面貌。万昭的姐姐万黛已定居美国，临走之际特地买了十本《摄魂》，分赠给在美国、台湾等地的海外亲友。

《摄魂》1990年5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广受欢迎，年终被评为1990年

中国青年出版社优秀读物。1994年12月易名《曹禺》，第4次印刷，为现代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之一，总印数达一万册以上。

我大学毕业工作近五十年来，继《摄魂》之后在曹禺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先后又出版了专著《走向世界的曹禺》、《曹禺剧作演出史》（40万字）、文学评传《曹禺成才之路》、《神州〈雷雨〉》（主编）、《世纪雷雨》（主编）、《永生雷雨》（主编）以及广播剧《一声惊雷》、六场话剧《神童曹禺》、《杰出的戏剧家曹禺》（电视传记片）等作品，并且以曹禺剧作研究为起点扩展到戏剧的其他领域，出版了若干专著。缘于曹禺剧作的戏剧情绪，将永远激励我孜孜以求，不断探索曹禺戏剧艺术摄人魂魄的真谛。

2012年12月

吴景超与费孝通的学术情谊

○吕文浩（1996研，历史）

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世人皆知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江村”调查中发展出来的乡土工业的经验，这一模式经过40年代对内地农村经验的总结，以及80年代以来的小城镇调查等，已经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发挥了重要而持久的影响。除此之外，还有一派重视都市化和工业化，并以其为核心来通盘考虑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学说却相对地较少为人所知。它的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吴景超教授。

特别凑巧的是，吴景超和费孝通作为这两派学说的代表人物，不仅有长久的师生之谊，而且在学术上能够相互肯定、相互欣赏、相互批评，成就了一段学林佳话。

乡土中国与放眼世界

吴景超生于1901年，长费孝通9岁，他1922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留美学习社会学，对芝加哥大学的都市社会学有深入的研究。吴景超的视野非常开阔，特别注意